
劉楨作品中的反諷與死亡*

魏寧 (Nicholas M. WILLIAMS)

香港大學中文學院

李泊汀、陳竹茗譯

建安時期 (196-220) 的詩歌雖以如實表現詩人個性著稱，但詩人們為了避免冒犯曹魏當權者，在表達思想和感情時不得有所收斂。也許是這種心理使然，他們在作品中對自己的真實想法往往有所保留，而以委婉甚至反諷的方式傳達心曲。本文以建安代表詩人劉楨 (?-217) 為研究對象，梳理並分析其作品中的反諷元素。《世說新語》中的一則軼聞透露了劉楨以反諷的方式自外於身處的朝廷，他的兩首代表作品也不像直抒胸臆的抒情詩，而具有更為複雜和不確定的內涵，箇中的矛盾有待發覆闡微。後世多以「風骨」一詞描述建安詩人的整體風格，這一傳統文學批評術語蘊含的內在張力恰好可借以印證本文的研究理路。在文網高張的情勢之下，建安詩人深知觸犯忌諱的

劉楨作品中的反諷與死亡

* 非常感謝兩位匿名審稿人提出的意見，促使我對本文作出大幅修訂，改動之大或許令他們感到面目全非。在此一併感謝李惠儀教授對於筆者另一篇文章所下的評語，而該文的撰寫也間接影響了本文的寫作。文中如有錯訛，概由本人負責。

文章可能招致殺身之禍。此外，一篇頌揚隱士友人的碑銘也為更好地理解劉楨帶來啟發。最後，對於建安時期的政治脈絡及其中的文學諷刺，正可以常見於當時文史典籍中的「虛器」喻象作一歸結。

關鍵詞：建安文學 劉楨 反諷 風骨 五言詩

一、引言

建安七子——孔融（字文舉，153–208）、王粲（字仲宣，177–217）、劉楨（字公幹，？–217）、阮瑀（字元瑜，？–212）、應瑒（字德璉，？–217）、陳琳（字孔璋，？–217）和徐幹（字偉長，171–218），作為五言詩創作的楷模而知名。¹東漢末建安（196–220）年間，七子與同在鄴城（今河北省臨漳縣西南）朝廷的曹操（155–220）父子朝夕論思，賦詩作文。話雖如此，他們並未同時聚首鄴城，因孔融於公元208年被曹操處死時，王粲仍留在劉表（142–208）麾下。

孔融遭戮一事對於我們解讀建安詩歌有著相當的重要性。建安詩人的作品充滿了痛飲狂歌、對功業的期許和滿腔的悲慨之情，無不與他們特定的個性和自身遭際緊密相關，在前代詩文中實不易看到這種個性化的表現方式。另一方面，這些詩作的創作背景頗為特殊，即某些表述方式

1 另一排序以曹植代替孔融，但就本文的關注點而言，仍宜包括孔融在內。以中文發表的當代相關研究包括江建俊：《建安七子學述》（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2年）；李文祿：《建安七子評傳》（臺北：文津出版社，2004年），以及王鵬廷：《建安七子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作品集包括俞紹初編：《建安七子集》（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韓格平編：《建安七子詩文集校注譯析》（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以及吳雲等：《建安七子集校注》（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

有可能招致殺身之禍。孔融被指控為大逆不道的表現之一就是「發辭偏宕，多致乖忤」，² 他也因此被處以極刑。在此背景之下，雖然曹操的世子曹丕（187–226）在孔融死後對其作品極力揄揚，孔氏的文侶仍然無法感到寬心。³

建安詩歌的「個性化和現實性」已經得到不少批評家的稱許，⁴ 特別是其中的「悲歌慷慨和直抒胸臆」。⁵ 但與此同時，詩人們所採用的表達手法卻受制於傳統的規範：陳詞套語、重現的主題和固定的修辭結構皆習見於建安五言詩歌。⁶ 從這些前人研究中，可隱約看出建安詩人久負的盛名，與其詩作的實際內容並不完全相副。⁷ 一方面，讀者肯

2 《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4年），卷七，頁2272。

3 同上注，頁2280。

4 Burton Watson 華滋生，*Chinese Lyricism: Shih Poetry from the Second to the Twelfth Centu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1), 44.

5 尤指王粲，見 Ronald Clendinen Miao 繆文傑，*Early Medieval Chinese Poetry: The Life and Verse of Wang Ts'an (A.D. 177–217)* (Wiesbaden: Steiner, 1982), xiii.

6 見 Christopher Leigh Connery, “Jian’an Poetic Discourse” (Ph.D. diss., Princeton University, 1991); idem, *The Empire of the Text: Writing and Authority in Early Imperial China* (Lanham: Rowman and Littlefield, 1998); 及 Stephen Owen, *The Making of Early Chinese Classical Poetr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6).

7 有別於上述提到的方法，一種新穎可喜的研究進路著眼於群體撰作，最能體現在史湘靈的博士論文：Shih Hsiang-lin, “Jian’an Literature Revisited: Poetic Dialogues in the Last Three Decades of the Han Dynasty” (Ph.D. diss.,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2013).

定其中的直抒胸臆和悲歌慷慨，另一方面，卻又發現他們因襲互用相近的表述。不過，我們只要考慮到這些詩歌的社會背景——朝臣競相討好奉承曹氏父子，唯恐落於人後——便可以想見建安詩歌在情詞懇切的同時，也自覺地摻雜奉承揄揚之辭，區別只在於二者孰多孰少。與此同時，建安詩人雖積極嘗試各種自我表達的方式，但不一定每次都能成功，有時唯有借助陳詞濫調，自出新意。

在文網高張、因言獲罪的政治局勢下，建安詩人很可能是有意噤口不言，甚至刻意語帶譏諷。現代意義上的「反諷」一詞，有兩個基本含義：「言語反諷」，透過遣詞用字來傳達言外之意；「情境反諷」，傳達出與一般預期相反的整個情境或結果。⁸ 不過，無論是這兩種反諷的類型，抑或齊克果（Søren Kierkegaard, 1813–1855）以來文學批評界所討論的種種其他含義，⁹ 在實際操作上並不容易區分。因為反諷的言語往往有賴於反諷情境呈現，正如在諷刺的情境下，人們所說的話往往被解讀為反話。因此，說

8 儘管筆者最終沒有採用這種分類，而傾向於更精細的劃分，但下列著作對反諷的基本概念有很好的說明：D.C. Muecke, *The Compass of Irony* (London: Methuen, 1969), 42–52. 另一經典研究是 Wayne Booth, *The Rhetoric of Iron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4).

9 見於齊克果 1841 年的博士論文：*The Concept of Irony, with Continual Reference to Socrates: Together with Notes of Schelling's Berlin Lectures*, eds. and trans. Howard V. Hong and Edna H. Hong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

古代作品意在諷刺時必須慎之又慎，但又不能忽略反諷的存在。對於身在曹氏政權下的建安詩人來說，言語反諷可說是他們的文學雄心與政治屈從之間失衡而導致的必然結果。¹⁰

因而，如果想要全面體認建安詩歌的慷慨悲涼，就必須挖掘其中的言外之意。從這個角度來看，早期五言詩的程式化特點或許不是缺憾，反而是其長處。如果限制直接表達的範圍，那麼至少從數學意義上看，意在言外的情感幅度必然得以擴大。在這種情況下種種背景信息，包括詩人的生平和詩歌以外其他體裁的作品就變得格外重要。下文將把劉楨的幾首詩作與他的其他作品和政治處境互相參照，以窺測詩作中向來被忽視的反諷基調。與「反諷」這一文學批評概念相輔而行，傳統中國文論術語「風骨」的辯證內涵也可以說明問題，闡明劉楨作品中隱含與明言、套路與變化的交互作用。只有關注詩歌隱而未彰的內容，方有可能體察字裡行間所描寫的世界的分量。

10 當今學界不太能想像建安詩歌蘊含反諷元素，或許是因為時移勢易，今人可以完全不受政治正統、利益考量和社會壓力左右而自由寫作，此所以不易體察古人左右為難、動輒得咎的窘境。

二、婉諷的妙答

一次對主上的失敬，可說是劉楨人生的一大轉捩點。¹¹ 相關記載以事件發生兩個世紀之後，劉義慶（403–444）編纂的《世說新語》所述最耐人尋味：

劉公幹以失敬罹罪，文帝問曰：「卿何以不謹於文憲？」楨答曰：「臣誠庸短，亦由陛下綱目不疏。」¹²

劉氏的行為不端及處分將於後文討論。這裡以「文帝」來

11 見《三國志》（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卷二一，頁601，下文會就此詳細討論。學者對劉氏生平的重構包括：伊藤正文：《劉楨傳論》，收入《吉川博士退休記念中文論集》（東京：筑摩書房，1968年），頁145–168，又見《建安詩人とその伝統》（東京：創文社，2002年），頁115–137；王運熙：《劉楨評傳》，收入《中國歷代著名文學家評傳續編》（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89年），卷一，頁201–212；又見王運熙：《漢魏六朝唐代文學論叢》（增補本）（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2年），頁308–317；杜貴晨：《劉梁、劉楨故里及世系、行輩試說》，《岱宗學刊》，2002年第3期，頁57；以及Fusheng Wu 吳伏生，“‘I Rambled and Roamed Together with You’: Liu Zhen’s (d. 217) Four Poems to Cao Pi,”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29.4 (2010): 619–33.

12 余嘉錫撰，周祖謨、余淑宜整理：《世說新語箋疏》（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言語篇，頁70。我在翻譯時參考了馬瑞志（Richard B. Mather）的權威譯本 *Shih-shuo Hsin-yü: A New Account of Tales of the World*. 2nd ed. (Ann Arbor: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2002), 34。（編按：譯文從略，下同）

稱呼對話者似乎不合適，因為曹丕在劉楨死後才稱帝。劉楨在回答中化用了《老子》的「天網恢恢，疏而不漏」，¹³原意是沒有人可以逃脫天理所加諸的命運，劉楨卻借用來指責主公慣於用刑，裁斷之「網」一點也不「疏」。採用這種含而不露的修辭，毋須明言也可以指責對方的不是：當朝臣無法公開表達自己的批評時，唯有報以反諷的妙答。

這則軼聞顯然不能視作信史。除了事件年代錯謬外，精關雅潔的對話本身也更像晉代文人的風格，其流風餘韻最能完整體現於《世說新語》的軼聞雋語。不過，作為一條對劉楨人生經歷相當早的「詮釋」，這則軼聞彌足珍貴。正如下文所論這條軼聞不乏歷史根據，反映依附曹丕和曹操，食其俸祿的劉楨始終對曹氏和自處的位置惶恐不安。這個例子也通過刻意修飾的應對，將那份惴惴不安形象地傳達出來。劉楨從未處於超然獨立的位置，無法開誠布公地表達自己的理想，只能間接地抒發憤懣。儘管「綱目不疏」的微言可能出自後人附會，但這一理解劉楨的角度不僅具有說服力，而且直接關係到我們解讀作品本意。

劉孝標（462-521）注解《世說新語》時引用了兩條材料，可以視為這則軼聞的史證。第一條見於魚豢（第三世紀）的《典略》：

13 陳鼓應編：《老子注釋及評介》（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第73章，頁334。

建安十六年，世子為五官中郎將，妙選文學，使楨隨侍太子。酒酣坐歡，乃使夫人甄氏出拜，坐上客多伏，而楨獨平視。他日公聞，乃收楨，減死輸作部。¹⁴

「太子」指曹丕，儘管當時他尚未被指定為繼承人。與《世說新語》的軼聞一樣，此處也出現了時代顛倒，或許反映出這些文本缺乏斷代史的全局視野，因而作者或編者未能盡力確保稱謂符合史實和時序。令人驚異的是，劉楨會因為「平視」或沒有迴避目光而遭受曹操處分。如果說「平視」都算逾矩行為，可以想見建安七子的作品還能有多直白坦率！這則故事解釋了《世說新語》中劉幹「失敬罹罪」之由。

劉孝標還引用了張隱（四世紀）《文士傳》中對後續發展的記述：

楨性辯捷，所問應聲而答。坐平視甄夫人，配輸作部，使磨石。武帝至尚方觀作者，見楨匡坐正色磨石。武帝問曰：「石何如？」楨因得喻己自理，跪而對曰：「石出荊山懸巖之巔，¹⁵外有五色之章，內含卞氏之珍。磨之不加瑩，雕之不增文，稟氣堅貞，受之自然。顧其理枉屈紆繞而

14 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頁 70。

15 借指著名的和氏璧。

不得申。」帝顧左右大笑，即日赦之。¹⁶

這條軼聞也可能經過了後人的修飾，即便如此，作為對劉楨和曹家當權者關係的詮釋亦自有其價值。這裡劉氏巧用文字遊戲，將自己比作珍貴的璞玉，不動聲色地為自己辯白。劉楨讚美玉石的妙語不能按字面理解，實是通過借喻試圖將主公和臣僕、施罰者和負罪者的關係轉移到美學的層面。這些事件應發生於建安十六年（211）或十七年（212），曹丕剛成為五官中郎將後。¹⁷ 此事之後，劉楨大約活了五年時間，其現存大多數作品都可以確定創作於這一時期。因此，這些傳聞軼事為閱讀劉楨作品提供了框架。

劉楨的立身處世之道也有其家世淵源，畢竟其祖上都謹小慎微，為了侍奉朝廷不惜暫時放下個人節操。憑藉有限的文獻資料，我們僅能粗略勾勒劉楨的生平大概，如將他的生年定為建寧三年（170），即純粹出於臆測。¹⁸ 他的家鄉在東平寧陽（今山東省寧陽縣），位於曲阜西北 25 公里外，是以成長過程中深受儒家學說熏陶，這點跟他的文友孔融、王粲和徐幹頗為相似。¹⁹ 劉楨的祖父（一說

16 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頁 70。

17 王運熙：《劉楨評傳》，頁 311；伊藤正文：《劉楨伝論》，《建安詩人とその伝統》，頁 133。

18 見王運熙：《劉楨評傳》，頁 308。

19 伊藤正文指出寧陽在曲阜西北 25 公里處，在此成長令劉楨對正宗儒家傳統別有會心。見氏著：《劉楨伝論》，《建安詩人とその伝統》，頁 115。

父親)劉梁(卒年介乎 178–184 年)是個飽學的寒士,一生沉淪下僚。²⁰ 他有兩篇傳世文章,即 破群論²¹ 與 辯和同之論。²² 其中第二篇所論的「和同」之別早已為孔子提出,劉梁則從實證主義的觀點出發,闡述了個人行為需因時制宜,並指出過分固守傳統道德將適得其反。這種見解若以更文藝的方式呈現,就會變成修辭上的反諷,暗示道德在現實世界中,只能以局部和差強人意的方式呈現。

在劉楨現存的作品中,找不到一篇明確申論劉梁觀點的說理文章,但他的好友、同為七子的徐幹著有《中論》一書,其中某些思辯頗近於劉梁。²³ 《中論》書名本身已表明其調和兩端的立場,其中 譴交 篇更直接呼應劉梁 破群論 中對黨派的抨擊。徐幹在別處言及各種德行的局限,並需視情況加以限制或擇善而從。 虛道 篇開章便把君子比喻作「虛器」——「人之為德,其猶虛器歟?器虛則物注,滿則止焉」,因為君子不會炫耀一己的德行,只會因時制宜施展才德。²⁴ 這裡或多或少暗示了矯飾在所

20 據劉梁本傳,劉楨是其孫子(《後漢書》,卷八十下,頁 2640),但《三國志》裴松之注所引《文士傳》言劉梁是劉楨的父親(《三國志》,卷二一,頁 601),無從定奪何說為優。

21 《後漢書》,卷七 下,頁 2635。

22 同上注,頁 2635–2639。

23 劉、徐二人的詩歌往還將於後文探討。《中論》除了《漢魏叢書》本和《四部叢刊》本,亦見於俞紹初:《建安七子集》,頁 254–321。

24 《中論》(《四部叢刊》本),卷四,頁 14b。

難免：一個真正的有德君子恥於露才揚己。²⁵

鄴下群臣深明妥協、甚至矯飾的必要。建安九年（204），曹操入主鄴城並定為軍事擴張的基地，不過劉楨是在此前還是此後投靠曹操陣營則未明。²⁶ 建安十三年（208）八月，世居於劉楨家鄉附近曲阜、孔子二十世嫡孫孔融被曹操處死。身為曹操麾下聲譽最隆的智囊之一，孔融之死對於其餘六子來說必然是一種警醒。²⁷ 因此，劉楨有充足的理由依從「虛道」、效法「虛器」，用反諷和迂迴的修辭來表達自我，畢竟此時此世，平視權貴的臉也足以獲罪。

25 《中論·虛道》：「君子常虛其心，志恭其容貌，不以逸群之才加乎眾人之上。視彼猶賢，自視猶不足也，故人願告之而不倦。」同上注。

26 可惜無法考據出劉楨抵鄴的確切時間。王運熙根據謝靈運的《擬魏太子鄴中集》（載《文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卷三，頁1436）主張應為建安初年，見《劉楨評傳》，頁309。但由於謝靈運並非為了忠於史實而創作，因此他的仿作不能視為史料。俞紹初根據同一條證據，將劉楨至鄴城的時間定為建安九年（204），見《建安七子年譜》，《建安七子集》，頁401。另外，伊藤正文認為直到建安十三年（208）六、七月間劉楨被拜為丞相掾屬之前，一直留在故鄉寧陽，見《建安詩人とその伝統》，頁136注五。曹道衡、沈玉成收集了多條間接證據，說明劉楨在建安元年至五年（196至200）之間抵鄴，見二人合著《中古文學史料叢考》（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頁63。

27 伊藤提出劉楨《贈從弟》其二直接效法署名孔融的雜詩（《建安詩人とその伝統》，頁119-120），但該雜詩僅見於《古文苑》，可信性值得懷疑。

三、書信修辭

儘管上引《世說新語》的軼聞有助我們從早期詮釋者的角度，理解劉楨的生平及作品，但始終不可作為第一手材料。幸而與研究其他建安作家的情形相似，不少散文篇章可以用來說明劉楨所處的景況。這些文章產生的背景基本上與宮廷有關，從中可以看出當時劉楨已落入朝臣的「虛器」而不得不採取迂迴曲折的書寫策略。有鑑及此，我們可以肯定這些記載有助深入體察劉楨的個性，並理解其礙於形勢而不得不採取複雜的修辭策略。

第一個例子是 答曹丕借廓落帶書。劉楨初以曹操麾下司空軍謀祭酒一職（後遷丞相掾屬）進入曹魏朝廷，數年後又轉到曹丕和曹植門下任職。建安十六年（211），曹丕就領五官中郎將，劉楨等數人轉拜五官將文學，為其僚屬。據說曹丕曾經贈送劉楨一條貴重的外國腰帶（廓落帶），隨後想暫借回來一用，於是寫了此信：

夫物因人為貴。故在賤者之手，不御至尊之側。今雖取之，勿嫌其不反也。²⁸

28 《三國志》裴松之注所引，卷二一，頁 601。「廓落」或作「郭落」，見 Otto Maenchen-Helfen, “Are Chinese *hsi-p'i* and *kuo-lo* IE [Indo-European] Loan Words?” *Language* 21.4 (1945): 256–60；他將這個詞定為希臘語 “κύκλος”（圓圈）和焉耆語（吐火羅語 A）中 “kukāl”（車輪）等的同源轉寫，實為一種匈奴人常用的皮帶。

信中同時流露了曹丕的機智和倨傲。劉楨的回覆則順應同一主題，用一系列喻體層層遞進，令人聯想起上引《文士傳》的軼聞：

楨聞荆山之璞，曜元后²⁹之寶；隨侯之珠，³⁰燭眾士之好；南垠之金，登窈窕之首；³¹鼉貂之尾，綴侍臣之幘：此四寶者，伏朽石之下，潛汙泥之中，而揚光千載之上，發彩疇昔之外，亦皆未能初自接於至尊也。夫尊者所服，卑者所脩也；貴者所御，賤者所先也。故夏屋初成而大匠先立其下，嘉禾始熟而農夫先嘗其粒。恨楨所帶，無他妙飾，若實殊異，尚可納也。³²

這封信表層的意思很簡單，即寶物總是由卑賤者生產或首先使用，然後才獻予尊者或為其徵用。劉楨在信末屈從於曹丕之請，因此讀者容易忽略他在妙用比喻時偷換概念，反客為主。劉楨非但暗示自己並非身懷至寶的卑賤者，更

29 即天子。

30 隨侯（或作隋侯）是春秋初隨國諸侯，因見「大蛇傷斷，以藥傅之，後蛇于江中銜大珠以報之」。事見《淮南子》（《四部叢刊》本），卷六，頁3b高誘注。

31 這種貴金屬通常稱為「南金」，如《詩經·魯頌·泮水》所言「大賂南金」，是淮河流域部族進獻朝廷的貢品。

32 《三國志》裴松之注所引，卷二一，頁601。另參韓格平：《建安七子詩文集校注譯析》，頁493-494；吳雲主編：《建安七子集校注》，頁613。

以寶物自況，因為荆山之璞、隨侯之珠等意象皆是賢臣的傳統喻象。

不過信中對於這些寶物的現況卻語焉不詳：究竟劉楨覺得自己仍「潛汙泥之中」，還是已然揚光發彩？此處也對被剝削略有微詞，似乎在暗示尊者擁有的一切無一出於自身，只不過是坐享子民的成果。這是一封老練得體且不失恭維的信，但劉楨所用的各式珍寶意象都不是指太子殿下，而是象徵股肱之臣，似乎在時刻提醒曹丕要懂得賞識劉楨這樣的能臣。雖然表面上傳達的信息是順應和屈從上級的要求，但其所用一切修辭手段無不肯定劉楨的自身價值。

建安十六（211）或十七（212）年，身為曹丕僚屬的劉楨有被革職的危機，但最終得到寬免並復職。諫平原侯植書 是他寫給曹植（建安十六至十九年間封平原侯），為其同僚邢顛（？-223）遭遇冷落而抱不平的信，³³ 從中可知劉楨隨後擔任平原侯庶子，為曹植效力。從 與曹植書 可見，劉楨對曹植的知遇之恩幾乎感激涕零：

明使君始垂哀憐，意眷日崇，譬之疾病，乃使炎農分藥，岐伯下鍼，疾雖未除，就沒無恨。

33 文載邢顛本傳，《三國志》，卷十二，頁383。繫年見王運熙：《劉楨評傳》，頁311-312；曹道衡、沈玉成：《中古文學史料叢考》，頁62-63。伊藤正文於 劉楨伝論（《建安詩人とその伝統》，頁123）中提出新說，認為劉楨可能先事曹植、再事曹丕，按這也是應暘出仕的順序。

何者？以其天醫至神，而榮魄自盡也。³⁴

該信的寫作背景並不清楚，但可以推斷在劉楨失禮於曹丕之後，對曹植的收留眷顧深表感激。劉氏在《贈五官中郎詩》其二亦言及疾病，及至建安二十二年（217）他確實與徐幹、陳琳、應瑒死於同一場疫癘，所以這裡所說的疾病可能並不單純是隱喻。炎農（或神農）是農業及醫藥之神，岐伯則是遠古時期一大名醫；末句中的「榮魄」一詞指軀體，「榮」是血液循環的專門術語，「魄」則與「魂」同時依存於身體。劉楨的意思是至神若得到滿足，身死亦無憾。

上文與《文心雕龍》所引劉楨的一則評語在形式上有一定的相似性，其文曰：「文之體（指）〔勢〕實強弱，使其辭已盡而勢有餘，天下一人耳，不可得也。」³⁵ 這條對於寫作本質的論述繼承了劉楨喜用的轉喻：形容某種東西生生不息，在自身終結後仍然發揮作用。劉楨在《與曹植書》中以此自況，而在《文心》引文中則借以論文。正是這種生與死之間的角力，賦予劉楨詩作非一般的魄力和風致。劉勰（約 465–522）在《文心雕龍·書記》中讚揚「公

34 嚴可均編：《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1893年刻本；臺北：世界書局，1969年翻印），《全後漢文》，卷六五，頁4a。

35 范文瀾：《文心雕龍註》（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臺北：學海，1993年翻印），卷三十，頁531。我依從周振甫的校改將「指」改為「勢」，見氏著：《文心雕龍注釋》（臺北：里仁書局，2001年），卷三十，頁590。

幹牋記，麗而規益」，並指出曹丕《典論·論文》在談論劉楨作品時遺其書札（「子桓弗論」）。³⁶ 劉勰的論斷可能基於劉楨的部分佚信，足以表明其書信集規勸與文采於一身。

這封信與前引有關劉楨辯才的軼聞共通之處在於，善用形象鮮明的對比：無論是形亡而神在、辭盡而勢有餘，還是潛藏汙泥之中的寶玉明珠，這些鮮明的映照對比正是劉楨詩文得力之處，在詩作中尤其廣泛運用。對於這種勢力的此消彼長可視具體情況作不同詮釋，既可看成對權力關係的暗諷，也可看作生與死之間永無休止的角力。

四、風骨與柏松

儘管在古代漢語中找不到「反諷」的對應詞，但六朝時期的「風骨」話語卻與此相涉。「風骨」一詞在後世評論中經常與建安詩歌相提並論，³⁷ 劉勰論風骨互補時說：「練於骨者，析辭必精，深乎風者，述情必顯。」³⁸ 在他看

³⁶ 范文瀾：《文心雕龍註》，卷二五，頁457。

³⁷ 英語論文甚少探討「風骨」一詞，比較重要的有：Donald A. Gibbs 季博思，“Notes on the Wind: The Term ‘Feng’ in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 in *Transition and Performance: Chinese History and Culture: A Festschrift in Honor of Dr. Hsiao Kung-Ch’üan*, eds. David C. Buxbaum and Frederick W. Motes (Hong Kong: Cathay Press, 1972), 285–93. 季博思將「骨」譯成 bone structure (骨架)，筆者認為頗有用，有時亦於行文時借用。

³⁸ 見《文心雕龍註》，卷二八，頁513。

來，風和骨是文學創作的兩大基本特徵，優秀的作品必須風骨兼備。骨或指作品的結構，或指明快爽朗的文風，而風則有傳遞思想情感的感人力量。不過與劉勰提出的「體性」、「通變」等相反相成的概念一樣，兩個元素都要盡力達到，而且並不孤立存在。

儘管風、骨二字各有固定的涵義，組合成複合詞也可用來形容性格，但筆者管窺所及，劉勰似乎是第一個用「風骨」談文論藝的人。³⁹ 風和骨在魏晉論述中常用於評價個人品格和儀表，其中風基本上是指人的氣質或舉止，骨則與骨幹、「脊梁骨」等相似，用來形容一個人剛毅堅韌的道德品質，如「骨鯁」一詞中的骨。與此同時，骨亦與其常用義骨頭有密切關係，所以即使用來談個性時，風骨可以與內外、身心等反義複合詞對舉。在美學批評領域中，這兩個概念率先應用於繪畫和書法上。「骨」可以如字面所示，指畫中主體對象的骨架，像顧愷之（341–402）形容畫家「作人形骨成而製衣服慢之」。⁴⁰ 與此同時，「骨」作為品性亦具剛健有力、生氣貫注的含義，如王獻

39 此論本於牟世金：《文心雕龍研究》（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5年），頁352–360，以及王運熙：從《文心雕龍·風骨》談到建安風骨，載氏著：《文心雕龍探索》（修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頁98–124，尤其頁102–108。

40 引自〔唐〕張彥遠著，俞劍華注釋：《歷代名畫記》（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64年），卷五，頁104。此句俞注曰：「先畫人形，完成骨法，然後再把衣服被上去。」按顧氏這段畫論往往指為出自《魏晉勝流畫贊》，但俞劍華已於校注本指出應為顧愷之《論畫》之誤，此處張彥遠似乎弄錯。

之（344–388）本傳在評論其書法時，稱「獻之骨力遠不及父」。⁴¹

隨後「風」和「骨」都被用於談詩論文，尤其是讚美行文生動而有說服力。儘管如此，分開來看風和骨之間不無對立之處。它們固然是可敬的品質，但各趨兩端：具體而言，風代表感染力或風格化傾向，是比骨更為基本的性質。風骨是兩種對立傾向的混合體，是把經驗昇華為藝術。落在個人層面，慷慨悲涼並不在於「直書其情」，恰恰相反，它只能在詩人著力弄清自身精神束縛時，透過其內心衝突而呈現。因此要追尋建安文風，我們有必要考察其書寫表達模式中內在的張力、傳達心意的渴求如何被權威人格所窒礙、自我的呈現如何在社會互動機制下往往流為誇張失實，以及作者人格的骨鯁剛直如何與文藝風韻的靈動交相碰撞。

劉楨在其名篇《贈從弟》中，形象生動地展現了這種對立概念的觸碰。以下是三首之二：

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風。
風聲一何盛，松枝一何勁。

41 《晉書》（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卷五十，頁2106。艾惟廉（William Acker）分析繪畫裡的「骨法」概念時發現，儘管它最初用於指人的「骨相體格」（skeletal structure），但後來引申出截然不同的意思，即「生氣貫注的筆法」。見氏著：*Some T'ang and Pre-T'ang Texts on Chinese Painting*, vol. I (Leiden: Brill, 1954), xxxv.

冰霜正慘悽，終歲常端正。
豈不罹凝寒，松柏有本性。⁴²

根據詩題，這首詩似乎是劉楨為稱許從弟而作，但詩中的寓言模式沒有明確的指涉對象，而且顯然是在訴說劉氏個人的品德追求。詩作以風和松的交錯平行（chiasmus）開篇，在結構上對應了這種象徵的勢不兩立。這種對立不受時間和季節所限，而是終年不斷地鬥爭，但無論如何持續施壓，松樹也沒有一刻變弱。詩中強調了風的角色，令人聯想起《論語》的名句：「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⁴³在某種意義上，即使身體不斷受到煎熬，松樹仍需要烈風和嚴寒才能在精神上茁壯成長。風和松的角色雖然對立，劉楨卻在首聯裡把它們對等並列，甚至像是在歌頌瑟瑟風聲。

作為仕宦生涯的隱喻，這首詩呈現出人間的黑暗面。傳統注家往往把這首詩解釋為劉楨品格高潔的自述。⁴⁴我們固然可以把詩作解讀成對士人的讚美，表揚其意志堅

42 《文選》，卷二三，頁 1115；《增補六臣註文選》（臺北：華正書局，1980年），卷二三，頁 44b-45a；全首亦見引於《藝文類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卷八八，木部上 松字條，頁 1513。

43 《論語·子罕》，第 28 條。

44 吳淇（1615-1675）稱劉楨詩如其人，「譬之喬松，挺然獨立」，見《六朝選詩定論》（揚州：廣陵書社，2009年），卷六，頁 138。與此類似，何焯（1661-1722）將 贈從弟 三首解讀為劉氏個人價值觀的陳述，見《義門讀書記》（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卷四六，頁 905。

定、像松樹一般耐得住風霜，靜心等待明君的賞識並委以重任。但要是這樣解讀的話，似乎想當然地認為劉楨對自己在曹魏政權下的現狀感到滿意。單以劉楨抵鄴後的遭際而論，我們知道他所受的「凝寒」也絕不鮮少。既然劉楨在寫「本性」，那麼大可把這首詩看成為狀寫某種普遍現實：寒士為侍奉暗主，必須屈服妥協。在這種情況下，成功往往意味著失德，吃盡苦頭方是志行高潔的明證。鍾嶸（？—約 518）對劉楨的評語是「貞骨凌霜，高風跨俗」，⁴⁵如果借來詮釋 贈從弟（其二）等作品，則似乎點出了寒冬的烈風跟堅忍的松柏一樣，皆為歌頌的對象。

某些修辭手法在劉楨筆下被一貫地運用，不僅五言詩如此，其他作品亦然。首先而且最重要的是，他用單一意象支撐起全段或全詩，並將形象進一步深化。其次，他善於用互動的方式開展形象，透過對立的勢力營造張力。第三，這種寫法所收到的效果是在作品中營造出衝突或矛盾，使得作品的重心落在某一意象，甚至凌駕於詩歌的主題之上。結果是，劉楨的作品可引申出多重詮釋的空間。喻象之中蘊藏著強烈情感，自然造成對個人表達的感同身受。不過，由於這些形象本身一再復現並往往套路化，我們無法簡單或不加批判地將之與劉楨的主觀內在聯繫起來。只有察覺到修辭中的內在衝突，像松柏和寒風的辯證關係，方能更深刻地體認劉楨的文心。

在評論這類作品時，當然可以借用「風骨」一類有助揭示內在張力的批評術語，不過西方習語中的反諷同樣適

⁴⁵ 汪中選注：《詩品注》（臺北：正中，1990年），頁81。

用。反諷在這裡不是打趣的言語反諷，而是以詩歌手段描寫情境式或悲劇式的諷刺。特里林（Lionel Trilling）曾言：「我們所說珍奧斯汀的第一種或基本的反諷，其實就是警覺到精神並不自由，即使有自由也是有條件的，受到環境所局限。一如大家從孩提時代所發現，這種現象實為畸形。她隨之而來的反諷指涉另一事實：正因為有這種反常，精神方有美德和意義。」⁴⁶ 這一分析完全可以套用到劉楨的松柏，而且在形式上比珍奧斯汀的小說更為凝練：松柏受環境所束縛，但恰恰是這種局限才讓它們的美德得以彰顯。不是劉楨所有的作品都能達到同樣的效果，但這種諷刺卻是其上乘之作的中心命題。

過去的文學研究者往往把焦點集中在王粲和曹植身上，似乎最富表現力和原創性的抒情詩人非此二人莫屬。但在六朝時期，劉楨的詩作同樣受到高度評價。⁴⁷ 《文選》收劉楨詩十首，對於一個詩人來說確實不少。他的詩亦備受後世批評家推崇，詳見王運熙的文章。⁴⁸ 不過與王粲和曹植相比，他的詩集顯得較為貧乏，或許是因為某些重要作品業已散佚所致。六朝時劉楨的文名主要得力於其詩作，而非其他文體。鍾嶸將他列為上品，尤其稱道其詩中的

46 Lionel Trilling, "Mansfield Park," *The Opposing Self* (London: Secker and Warburg, 1955), 207.

47 伊藤正文曾對劉楨的詩作進行詳細調查，頗資參考，見氏著：《劉楨詩論》，載《近代》第51期（1976），頁1-51；收入《建安詩人とその伝統》，頁138-187。

48 王運熙：《談前人對劉楨詩的評價》，收入《漢魏六朝唐代文學論叢》（增補本），頁318-331。

「氣」和「奇」——「仗氣愛奇，動多振絕。」⁴⁹換言之，劉詩的特徵是用字新奇而易曉，文風剛健而不誇飾。曹丕嘗言「文以氣為主」，⁵⁰因此在這個意義上劉楨堪稱是建安風格的傑出代表。

伊藤正文用現代的說法將劉詩歸結為動態性 (dynamic)，而王粲詩因多用典故和對偶，所以屬於靜態性 (static)。⁵¹將這種獨到觀點引而申之，我們可以試著觀察劉楨如何描寫一系列情緒或別的力量之間的「動態」關係，審視松樹的品性如何通過風的磨練而得到考驗和印證。

五、背時的「乖人」

劉勰提出的「風骨」概念有廣泛適用性，甚至有論者認為是普遍存在於一切文學作品的屬性。但單就劉楨詩而言，我們可以視之為強烈個人情感（作者和作品的骨力）及映襯手法（跟其他文學作品和讀者交流的表達方式）的結合。狹義地說，風骨就是暗諷，其中慣見的修辭手段被賦予新生命，在脫離作者掌控之餘又反照著他。且看劉楨的《贈徐幹》，這首詩有二十二行，在劉楨作品中篇幅較長，當中交織著若干條貫穿於劉楨作品、以至建安文學的主要線索。全詩一韻到底，但我根據內容將它分為三章：

49 《詩品注》，頁 81。

50 見 典論·論文，《文選》，卷五二，頁 2271。

51 伊藤正文：劉楨詩論，《建安詩人とその伝統》，頁 142-143。

贈徐幹

誰謂相去遠，隔此西掖垣。
 拘限清切禁，中情無由宣。
 思子沉心曲，長歎不能言。
 起坐失次第，一日三四遷。

步出北寺門，遙望西苑園。
 細柳夾道生，方塘含清源。
 輕葉隨風轉，飛鳥何翻翻。

乖人易感動，涕下與衿連。
 仰視白日光，皦皦高且懸。
 兼燭八紘內，物類無頗偏。
 我獨抱深感，不得與比焉。⁵²

徐幹 答劉楨詩 雖亦表達同一情緒，但無甚精彩之處。⁵³
 從詩中表現的強烈情感來看，可能是作於劉楨失禮甄夫人而受罰的期間，又或隨後因獲罪而令清譽受損之時。事實上，這首詩的創作脈絡不易確定，特別是因為劉楨喜用生僻的詞藻（如清切）。這些生僻詞在存世文獻中鮮見（當然在時人口語中未必稀奇），其實也構成了他偏向動態、立意奇詭的文風。如果詩人是在巧妙翻用經典典故，像有

⁵² 《文選》，卷二三，頁 1113-1114；《增補六臣註文選》，卷二三，頁 43b-44a。

⁵³ 見《藝文類聚》，卷三一，頁 546。

些建安文人那樣，現代學者不難找出每個詞的出處，但對於劉楨的某些作品來說卻無法做到。這樣靈機一動地自鑄新詞，至今仍為讀者塑造出鮮活的印象。

有關首兩句的解讀，五臣註中的呂延濟註曰：「是時徐在西掖，劉在禁省，故有此詩。」伊藤正文加以闡發，推測劉楨作詩之時應在少府下的尚方（宮廷御用作坊，相當後世的造辦處）服役，因日夕與閹人為伍而更感羞恥。⁵⁴ 隨後幾句道出了孤立無援和思友之情，第七和第八句更自言想安心工作卻一直坐立不安，一如他的 雜詩 般道出了寫實的動人細節。不過此詩的突出之處是，有別於大部分漢代五言詩抒發的普遍化情緒，首兩句建立的背景非常明確具體。

第二章著力描寫宮廷附近的苑囿，看起來有點難以理解。劉楨是真的幽處禁省，不得動彈嗎？若然如此，何以他可以在外面漫步，徐幹又為何不能相陪？其實我們可以將此部分理解為詩人的神遊，旨在描繪他想做的事情，第一章則是對現狀的實寫。第十三、十四句寫到鳥兒翻飛可算這組情景的自然結束，象徵著自由與暢快。這份心情又與開篇時的情調何其遠也！實際上我們是「被迫」作出上述或類似的解讀，這又是詩中個別常用字眼使然。譬如曹植的 公讎詩⁵⁵ 和曹丕的 芙蓉池作⁵⁶ 都提到本詩第十句中的「西園」。曹植詩中同時出現的「綠池」、「清波」和「好鳥」等字眼，都在本詩中一一獲得照應。這些宴遊

54 伊藤正文：劉楨詩論，《建安詩人とその伝統》，頁160-161。

55 《文選》，卷二，頁942-943。

56 同上注，卷二二，頁1031-1032。

詩大概作於建安十六年（211）初秋，與劉楨自己的「公讌詩」同時。⁵⁷ 如果這種大膽假設不錯，致徐幹「此章是在回想當年宴遊的盛況，但這時的心境已截然不同，因此這種對照只能視作反諷。

果不其然，第三章便在極寫此情此景下的劉楨何其孤單。他無法逃避自己的處所、自己的刑罰，正如人類不似飛鳥，無所逃遁於蒼茫大地。這還不止，在全詩之末劉楨不僅感到自絕於君恩，甚至認為普天之下蒙王恩覆載的眾生都「不得與比焉」。總括而言，這首詩與劉楨的典型風格不同，並沒有圍繞單一意象做字字珠璣的構築，而是像一組三聯畫（最好與其「贈從弟」組詩對照）：首先是個人思念，接著是神遊方外，最後是一個孤苦罪臣的自我沉思。

本詩在風格上完全符合後世對劉楨的評價，達致「氣」和「奇」的極則，其中自稱為被疏遠的「乖人」，尤其令人絕倒。他的「乖」，並非像隱士般離群索居，而是對自己的位置感到不自在，竭力讓自身與備受疏離的處境重新取得調和。這裡可以比較一下劉楨其中一首最具原創性的詩，極寫公務繁冗的「雜詩」：

職事煩填委，⁵⁸ 文墨紛消散。
 馳翰未暇食，日昃不知晏。
 沉迷簿領書，回回自昏亂。
 釋此出西城，登高且遊觀。

⁵⁷ 伊藤正文：劉楨詩論，《建安詩人とその伝統》，頁146。

⁵⁸ 此處據五臣本異文，以更具感染力的「煩」取代「相」。

方塘含白水，中有鳧與鴈。
安得肅肅羽，從爾浮波瀾。⁵⁹

相信二十一世紀的學者不難對劉楨的處境產生共鳴，這首詩亦與《贈徐幹》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在這兩首作品中，詩人都疲於現狀，想去附近的池塘遊覽散心，甚至想像自己如鳥兒般自由。

將《贈徐幹》放在此一脈絡下理解，處於三聯畫中心位置的陳詞套語便賦予了非常個人的意義；它們作為劉楨記憶的標記，在新語境下獲取全新的意義。同一個詞語，甚至同一行詩句、對句，都會因應情境的差異而代表不同的意思，就像同樣的詞語，對曹丕和劉楨來說亦有截然不同的含義。言語反諷固然是劉楨這篇傑作的中心所在，但同樣應該放進鄴下朝廷充滿諷刺意味的背景下去考察。

六、沖盈的虛器

建安十七年（212），尚書令荀彧（163–212）一直貴為曹操攀上權力高峰的過程中最倚重的軍師，竟出言諫阻丞相加封九錫。⁶⁰ 曹操在稱王之前有必要先受九錫之禮，

59 《文選》，卷二九，頁1359–1360；《增補六臣註文選》，卷二九，頁18b–19a。

60 《三國志》，卷十，頁317。相關討論亦見 Rafe de Crespigny 張磊夫，*Imperial Warlord: A Biography of Cao Cao 155–220 AD* (Leiden: Brill, 2010), 385–87.

料想不到竟在自己陣營內遭遇反對，為此「心不能平」。他將荀彧從尚書令遷至地位崇高而無實權的光祿大夫，大大削弱了他的勢力。未幾荀彧染病，曹操饋以食器，內裡卻空無一物，彧旋即仰毒自盡。⁶¹

同年，劉楨為其摯友作了一篇題為「處士國文甫碑」的墓誌銘。⁶²在對這位堅決不仕曹魏的友人稱頌備至之餘，劉氏亦暗中流露了對自身處境的諷刺：為了侍奉一位霸主，身為朝臣不得不改變節操。

碑銘前的序文讚揚了國氏的「清節」，解釋了何以要為他樹碑立傳。接著是以四言詩寫成的銘詞：

懿矣先生，天授德度。
外清內白，如玉之素。
逍遙九臯，方回是慕。⁶³
不計治萃，名與殊路。
知我者希，韞積未酌。

61 見《魏氏春秋》，轉引自《三國志》，卷十，頁317裴注。這則饋贈空器的故事可能出於杜撰，但頗得情實。

62 嚴可均：《全後漢文》，卷六五，頁4b-5a；《藝文類聚》，卷三七，頁658-659；俞紹初：《建安七子集》，卷七，頁201-202。值得注意的是，上海古籍排印版本《藝文類聚》似乎將本詩最後一句的「歡」錯排為「歎」。俞紹初亦誤作「歎」，但嚴可均《全後漢文》、《四庫全書》本《藝文類聚》，卷三七，頁4a，以及《劉公幹集》（《四庫全書》本《漢魏六朝百三家集》）皆作「歡」。感謝香港浸會大學同事陳偉強教授指正。

63 方回是與堯同時代的傳說隱士，事見《列仙傳》，轉引自《太平御覽》（《四部叢刊》本），卷一八四，頁3a。

喪過乎哀，違疾不悟。
 早世永頹，違此榮祚。
 咨爾末徒，聿修歡故。⁶⁴

這篇挽辭本於《論語》一段有名的對話：「子貢曰：有美玉如斯，韞匱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⁶⁵ 這裡強調了一個人有責任善用天賦，不應獨善其身、遺世獨立——畢竟古訓有云「良禽擇木而棲，賢臣擇主而事」。劉楨深刻意識到要是出賣了自己清白良心的美玉，總有一天會迎來失望，用其友人徐幹的話就是變成「虛器」。

很少有人將這首詩與劉楨的詩作相提並論，原因之一是该篇碑銘被歸類為「文」（文筆之文，並非散文）。讀者可能注意到這首有韻四言詩與《詩經》體完全一致，並確實借用了當中某些用語。此外，本詩集劉楨詩文的幾個主要命題於一身：朝臣的角色（包括放逐之臣與名公巨卿）、友誼與美德的關係，以及面對投閒置散甚至死亡時，為保全正直人格而做出的抗爭。這裡緊湊的四言句式使劉楨的情緒得以高度有效地傳達。試看第七、八兩句：

不計治萃，名與殊路。

64 「聿修」一詞見《詩經·大雅·文王》：「無念爾祖，聿修厥德」。

毛傳釋「聿」為「述」，即傳承之意。

65 《論語·子罕》，第13條。

我們知道在《史記》中「殊路」一詞後緊接「同歸」。⁶⁶ 因此這裡隱隱暗示隱士選擇的道路表面上好像跟朝士不同，但他們最終或許殊途而同歸。

挽辭的最後一句「聿修歡故」也隱含矛盾。該句的前半襲用了《詩經》的成語「聿修」，始見於周人史詩《大雅·文王》，全句為「聿修厥德」。在其他早期的用例中，「聿修」也往往伴隨「德」或相近似的詞語出現，如干寶（？-336）《晉紀總論》云：「（晉武帝司馬炎）聿修祖宗之志」。⁶⁷ 從始見之例到劉楨所處之時，「聿修」的用法總離不開王朝廣續與帝國霸業。但此處卻緊接遠為卑微和私密的「歡故」。這種用法跟上一句的「未徒」一樣非常罕見，至少在經典中找不到明確先例。⁶⁸ 除了表達對朋友的心意，很難讀出別的含義。

這篇碑文或許欠缺劉楨向來為人稱道的「氣」，四言句式也稍嫌拘謹。另一方面，這篇銘文雖然乍看起來像一篇拼湊《論語》和《詩經》的傳統作品，但劉楨的某些詞語搭配卻頗為新奇，甚至稱得上是原創。我們已見識過他五言詩中的原創措辭，看來其四言詩也毫不遜色。這種將時人共用的套語和自創的新奇表達交錯，讓個人情感與傳

66 《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卷二三，頁1160。

67 嚴可均編：《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晉文》，卷一二七，頁6b。

68 在《漢語大詞典》和《大漢和辭典》「歡故」詞條下都只引此一條書證。分別見《漢語大詞典》（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1994年），卷六，頁1476；及諸橋轍次：《大漢和辭典》（修訂版）（東京：大修館書店，1989-90年），卷六，頁6365。

統形式交相碰撞，可謂再次展現了劉勰對「風骨」的論述。同時借用表示王權廣續的堂皇詞藻，向一位畢生抗拒被當權者收編的摯友獻上一瓣心香，這種交錯混用也不無諷刺意味。

反諷誠非簡單的現象，要切實理解建安朝廷，以及劉楨最偉大的詩作，實在不得留神於此。或許正因此，《世說新語》編纂者才刻意為劉楨這個人物加插一段婉言而諷的妙語。進而言之，考慮到劉氏個人處境的艱苦（亦是其同僚共同的苦況），以及在直書真情實感時遭遇的障礙，反諷的出現更是順理成章。在劉楨為友朋之樂和知遇之恩而欣喜萬分之際，他亦不得不對自身處境和國家局勢感到坐立不安。在建安十七年這個多事之秋，他對隱士友人的同情便很可以理解，這也為閱讀其他劉楨的詩作提供了一把鑰匙。「虛器」不虛，意義沖盈。